

中国近代爱国人物故事丛书

主编：张海鹏 徐辉琪

共产主义先驱



● 范春荣 王凌云等 ●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中国近代爱国人物故事丛书

张海鹏 徐辉琪 主编

共产主义先驱

范春荣 王凌云等

福建教育出版社

编 者 的 话

在我们的祖国不断改革开放、追赶世界前进步伐的今天，青少年朋友，你们知道，曾有多少爱国志士、民族英才为此奋斗过吗？

1840年，西方侵略者的枪炮轰开了封建中国紧闭的大门，灾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史也从此开始。从那时起，许许多多的爱国者开始认识到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为了寻求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道路，他们不畏艰难险阻，甚至不惜献出热血和生命，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也留下沉重的历史教训。

在这套丛书里，我们要告诉青少年朋友的，就是这许许多多民族英才追求、奋斗的故事。他们中有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魏源；有主持变法图强的康有为；有民主斗士；有民族工商赤子；更有为民族的解放与进步而奋斗不息的共产党人……

这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专家张海鹏、徐辉琪主编。丛书中收录了中国近代一百多位爱国人物的故事，分成14个分册出版，每册介绍一个领域或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代表人物。无论在编排上，还是内容表述上，它都与已出版的各种爱国人物传记有所不同，不仅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还具有故事的生动性。内容丰富，情节曲折，文笔流畅，

亲切感人，特别适宜青少年朋友阅读。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增进青少年朋友对近代中国的了解，增强民族自信心，认识中国的过去，珍惜今天，为祖国的未来而奋发向上。

1992年12月

目 录



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	范春荣 (1)
建党前后的陈独秀·····	李子谦 肖贵洞 (29)
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瞿秋白奋斗的一生·····	王凌云 (47)
革命青年的楷模——恽代英·····	陈家新 (73)
工人阶级的杰出领袖	
——邓中夏光辉的一生·····	王凌云 (90)
“农民大王”彭湃·····	吴雪玲 (110)
“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	
——蔡和森战斗的一生·····	范春荣 (128)
妇女解放事业的先驱向警予·····	范春荣 (152)
“革命事业耿耿在怀”	
——方志敏清贫战斗的一生·····	胡淑敏 (167)
“独窗难锁钢铁心”	
——王若飞在狱中斗争的故事·····	朱 琳 (181)

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

范春荣

李大钊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他首先在中国宣传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奠基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一生热烈追求真理、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青年忧国者

1889年10月29日（阴历10月6日），李大钊诞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从小失去双亲，由垂老的祖父哺养。祖父见他聪明好学，让他去私塾读四书五经。李大钊10岁时成亲，夫人赵纫兰，比他大六岁，辛勤操持家务，侍奉老人，维持一家生计。李大钊则刻苦用功读书，16岁时曾应科举中举，时值清政府废科举办学堂，遂考进永平府中学读书。二年后，年逾八十的祖父去世，家境更趋贫困，他靠着夫人的支持，到天津继续求学。

20世纪初年，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清朝统治日

趋腐败，民族危亡，迫于眉睫。李大钊目睹这种情况，感到研究政治才是挽救民族、振奋国家的关键，决心投考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

在校六年间，李大钊学习了政法各科及英日语言，阅读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书籍，接受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要求民主自由的思想。随着政治知识的增进，他萌发了再建中国的思想。辛亥革命的失败，更激发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感，以悲痛的心情写下了《隐忧篇》和《大哀篇》，立志要为国家寻找新的出路去努力奋斗。

1913年底，李大钊东渡日本留学，住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为入学做准备，他一面博览群书，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国内外形势，写出《风俗》、《政治对抗力之养成》等文章，一面补习英语，并用英语写了《我的自传》。1914年9月8日，正式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本科学习。

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袁世凯想当皇帝的心理，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在《大阪朝日新闻》上见到这则消息后，立即奔走相告。各省留日学生闻风而动，群起反对，于2月11日召开留日中国学生大会，成立留日学生总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在会上，李大钊被选为总会的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负责起草各种文告。他花了几昼夜的时间，搜集各报刊上的资料，写成了《警告全国父老书》，揭露了“二十一条”的内容，沉痛地指出：“凡兹条款，任允其一，国已不国”。要求政府秉承国民公意，拒绝日本政府的无理要求。6月，李大钊编辑出版了总会出版物——《国耻纪念录》，他在本书中写下了

《国民之薪胆》一文，详细记述了日本侵占山东和提出“二十一条”的过程，要求全国人民象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那样，“蕴蓄其智勇深沉刚毅果敢之精神，磨练其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之志气”，挽救中国于危亡之际。

第一学年，李大钊在一面参加反对“二十一条”斗争的繁忙之中，一面完成学校严格的课程考试。第二学年刚念了四个月，校本部对他激烈反日态度极为不满，即以“长期欠席”为由予以除名。早稻田大学本科修业年限应为三年，李大钊在校不到一年半，就被迫辍学了。

1916年1月，为了支持护国军的反袁斗争，李大钊曾代表留日学生总会返回上海，这时，他已立下了回国革命的决心。正如他在诗中所表达的：

鹏鸟将图南，扶摇始张翼。

一翔直冲天，彼何畏荆棘。

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

男儿尚雄飞，机失不可得。

两周后，李大钊返回东京，与几个朋友住在东京郊外高田村的月印精舍，舍外是荒芜的小园，后面有依假山而建的古刹，假山前的池塘边，错落地种着梅花和樱花。在这大自然的怀抱里，他感到应当唤起众多的青年人的朝气，为青春之中华奋斗，他写道：“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他写完之后，定名为《青春》寄给陈独

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发表在九月份第二卷第一号上。《青春》一文，表达了李大钊革命的民主主义精神及唯物主义世界观，提出了著名的创造青春国家的革命理想。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1916年5月，李大钊乘轮船启程回国，他站在甲板上，望着波涛汹涌的海浪，归心似箭，恨不得立即踏上国土，投入到火热的爱国斗争中去。李大钊到上海后，听到袁世凯于6月6日病死的消息，正准备计划下一步的工作，这时收到北京汤化龙等人的邀请信，请他到北京办报纸。李大钊想到办报纸可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于是决定去北京。

到了北京，李大钊立即投入工作，他自任总编辑，报纸很快在8月15日创刊了。他给报纸取名《晨钟》，象征着“新生命之诞孕”。他还亲自为报纸社论设计了一个古钟图案，上面每天印一条警句。在第六号上印的是他经常书写的名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也是李大钊一生高尚品德的写照。李大钊在《晨钟报》上经常发表反帝反封建的文章，揭露军阀官僚以及政客们的黑暗面，这引起报纸的发行者研究系汤化龙的不满，时时派人删改他的文章。李大钊看清了他们不过是一夥军阀的工具，于是毅然辞去了《晨钟报》主编职务，离开了由他一手创办起来的《晨钟报》。随后章士钊聘请李大钊任《甲寅日刊》编辑。他几乎每天或隔天就在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反对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封建文化，介绍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

统治消息，还宣传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的革命活动等等。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召开伪国民议会，讨论制宪问题，该提案仍以袁世凯“天坛宪法草案”为基础，其中有“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条例。李大钊坚决反对，写文章批驳了孔子的旧道德，他认为孔子的道德观是“专制政治之灵魂”。他说：“孔子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和“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因此，不应当迷信孔子，而应当相信真理。在新与旧的矛盾斗争中，李大钊总是站在新思想的立场上与旧思想作顽强的搏斗。

1917年7月，军阀张勋在德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率领他的“辫子军”占领北京，把已经推翻了的清朝宣统皇朝皇帝溥仪，重新扶上宝座。李大钊在张勋复辟时被迫离京，避居上海朋友家中。他的心情沉痛而苦闷，想到无数先烈为国家民族的改造而流血牺牲，自己“流离转徙”十几年，为改造国家奔走呼号，但却并未能改变现状，心情十分沉痛。他写下了一首七律诗，寄给在江西的朋友，表达了当时的忧虑情绪。

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到万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

此时的李大钊虽然有些伤感悲愤，但他仍然关心着时局的发展，不断地学习，总结历史教训，随时准备再斗争。

“五四”激流献丹心

1918年1月，李大钊回到北京，由章士钊推荐，接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职务。国立北京大学是全国最高学府，校长蔡元培，是著名的资产阶级教育学家，他的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际上是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当时就已著名的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他在1915年9月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是进步青年最喜爱的读物。李大钊与陈独秀等人都属思想激进的新派人物。到北大后，他与陈独秀两人轮流编辑《新青年》杂志，大力传播新文化、新思潮，提倡民主、科学，继续引导全国青年开展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

李大钊对于传播新文化的社团和报刊，总是热情支持。或亲自参加，或为他们撰稿，或被聘为顾问，为他们出主意。例如，以反对中日密约为宗旨的学生救国会，这时发展为国民社，就聘请李大钊任导师。这个社的骨干分子如许德珩、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都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积极参加者和带头人，这与李大钊的指导和影响是分不开的。在此期间，李大钊还与王光祈、周太玄等七人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并被推选为《少年中国》杂志编辑主任。学会于1919年1月正式成立，总会设在北京，南京、成都等地都设有分会，会员多时达一百多人，其中有不少国家主义者，后来内部分化了。但早期在李大钊指导下，加上毛泽东、张闻

天、邓中夏、沈泽民、黄日葵、恽代英、高君宇、赵世炎、蔡和森、李达、杨贤江、缪伯英、许德珩等人的参加，使该学会在五四运动时期主要起了进步作用。其他如邓中夏发起成立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与李大钊的关系更为密切。

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期间，注意研究国外新学理、新思潮，以便从理论上研究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他注意搜集和研究各国革命运动的资料，尤其关心俄国革命问题。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论述俄国十月革命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的区别，认为俄国今日的革命将比法兰西革命产生更大的影响，明确指出俄国革命性质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者也。”从理论上阐述了俄国十月革命是揭示出“20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其功绩在于革命以后，“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在这篇文章里李大钊以无比的热情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认定它是未来中国革命的方向。在这以后，随着国际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李大钊很快地由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了。

1918年秋，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管理员，他们在一起办公，李大钊在里间，毛泽东在外间，经常相互交流马列主义革命思想。后来，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曾满怀敬意地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可见，李大钊的言行，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德奥同盟国而告结束。北洋军阀政府于一年前向德奥宣战，因而也算是战胜国。北京城挂起了五色旗和英法美日等协约国各国旗帜，到处是“公理战胜强权”的宣传。但李大钊却不这样看，他在天安门前的讲演中指出：这次大战的结果，是民主主义战胜，是劳工主义战胜，也就是庶民的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他后来把这次演说写成文章，登在《新青年》杂志上，那就是著名的论文《庶民的胜利》。他在另一篇论文《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中还说：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而一切历史的残余——皇帝、贵族、官僚、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都要被群众革命的巨流彻底摧毁，他写道：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李大钊与陈独秀特别创刊了《每周评论》，登载一些批评时政的短文，推动当前政治斗争。1919年元旦，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三号上发表了题为《新纪元》的元旦社论，提出劳工阶级联合起来，“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的资本的阶级，直到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的观点。

1919年4月底，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要求日本归还青岛的交涉失败，消息传到国内，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慨。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平民讲演团首先跨出校门，走上街头，向市民进行“抵抗强权”、“争回青岛”的宣传。5月4日，终于爆发了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运动。愤怒的人群和学生，一早就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示威游行。大家举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宁为玉碎，勿为

瓦全”、“拒绝和约签字”等旗帜，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在路途中，烧毁了卖国贼曹汝霖的住所，痛打了另一个亲日派章宗祥。反动的军阀政府下令驱散游行队伍，逮捕了学生和市民30多人。此后，五四运动发展为全国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5月9日，北大校长蔡元培被迫辞职出走，李大钊率领北大教职员代表向反动的军阀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校长回校。他还和陈独秀一起商量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要求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废除反动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订立的密约，提出撤消步军统领和警备司令管辖的两个直接压迫人民的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市民应有绝对的集会、言论自由的权利等等。11日下午，李大钊和陈独秀分别带人到热闹地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李大钊等三人来到城南游艺园，悄悄地把传单全部送到了群众手里。

由于人民群众的反对和斗争，终于迫使反动政府不得不下令专使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向广大群众公布了这个电文。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中起了一个组织者、领导者的作用，他的伟大的功绩，值得后人永远缅怀与敬仰。

为创建共产党呕心沥血

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且日益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准备和干部上的准备。李大钊当时最先接触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为着革命斗争的需要，经常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几乎每星期都

写一至二篇，长短都有，涉及政治、经济、思想道德以及社会问题等。在学校放暑假时，李大钊准备到家乡乐亭附近的五峰山韩文公祠住上一个月，以便精心写作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时，他看到新出的《每周评论》上登载了胡适写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心中很生气，感到有必要给革命的人们在斗争中指出明确的方向。他写了答复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和主义》的文章，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发表，宣称自己是要谈谈“主义”的，并指出，靠点滴改良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也许是这个“根本解决”的号召，吓坏了北洋军阀政府，在李大钊回北京后不久，反动当局竟查封了《每周评论》。面对军阀政府的压迫，他写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宏文，继续大谈“主义”，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在担任北大经济学教授的时候，李大钊一面讲课宣传马列主义，一面写出《从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由》、《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着重宣传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的这些论文和讲课，在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青年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0年1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去上海。为了避开敌人暗探的跟踪，李大钊化妆成下乡讨债的商人，揣着账本，陈独秀头戴一顶毡帽，身穿一件满是油渍的厨师衣服，俩人坐骡车出朝阳门，往东走去，先到李大钊的家乡乐亭县休息

了几天，然后又走了好几天到天津。李大钊一直把陈独秀送上了去上海的船才回来，在路上，李大钊与陈独秀商讨了关于建党的问题。3月，在李大钊领导下，由邓中夏等公开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有高崇焕、邓仲澥（中夏）、罗章龙、吴汝明、黄绍谷、王复生、黄日葵、李骏、杨人杞、李梅羹、吴容沧、刘仁静、范鸿劼、宋天放、高尚德（君宇）、何孟宏（孟雄）、朱务善、范齐韩等19人。当时，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维经斯基及俄籍人杨明斋等来到北京，与李大钊见面。李大钊热情接待，邀集进步人士与他们坐谈，并举行欢迎会，讲演会等，然后，在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里李大钊与维经斯基深入讨论了建党问题，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4月间，李大钊还介绍维经斯基等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商建党工作。

在李大钊指导下，一部分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进行着紧张的活动。他们每天一大早就去北大三院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下午从事政治、社会活动，晚上聚在一起讨论革命问题，总要到深夜才睡觉。

1920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举行了第一次隆重的纪念集会。李大钊主持了北京大学的集会，参加的工友和学生五百余人，会后还坐着汽车，车上插着红旗，到各大街去散发传单。邓中夏等也到长辛店工人中集会并发表演说，到会工人一千多人，会后也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通过这些有组织的活动，产生了进一步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强烈要求，为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作了准

备。9月，北京建立了共产党小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后来叛党）、罗章龙、刘仁静（后被开除出党）、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女）、范鸿劼、李骏、张申府等人，都是北大学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因当时没有建立革命机关，李大钊领导着小组的成员经常在他家里和他的图书馆主任办公室里开会。

11月7日是十月革命节，李大钊领导下的北京共产党小组创办了通俗小报《劳动音》，以便更好地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开展工人运动。同时，他还指引平民教育讲演团，积极从事工人运动，每逢星期天，讲演团的几个人一清早就坐上火车到长辛店，找工人谈心，交朋友。他们还筹建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给工友们讲课，从为什么下雨打雷讲起，讲到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工人要团结起来向军阀、官僚、资本家斗争！讲阶级斗争，讲苏俄十月革命，讲工人要组织工会等。经过这些深入浅出的点拨、指导，工人们心里亮堂了，工人俱乐部里经常传出了工人们粗壮嘹亮的歌声，

如今世界太不平，重重压迫我劳工，
一生一世作牛马，思想起来好苦情。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
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
只要我们团结紧呵！冲破乌云满天红！

1921年3月，李大钊亲自到河南郑州去开展革命工作。他到工人夜校去讲课，课堂里挤满了工人，李大钊讲：“你们工人可不矮啊！工人够上天那么高呀！”说着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个“工”字，又在“工”字下面添了个“人”字，含